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 深圳独特功能与使命

陶 一 桃

摘 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不是对国际循环的否定，更不是对外向型经济的否定，而是经济结构优化、现代工业体系营建以及更高水平开放格局构建的整体战略布局，它是 40 多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也是这一政策新时代、新形势下更深刻且具有挑战性的拓展与深化。深圳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列，这既是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也是有效实现“双循环”的大前提；深圳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优良产业结构，这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深圳应该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及独特要素禀赋竞争力，在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制度保障的制度创新领域，创造出富有制度绩效的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做法。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高水平开放；外向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1) 02-0020-0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等，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这是中国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作为。2020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公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功能，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示范者；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可以说，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的新发展格局，源于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力的根本提升，源于 40 多年来对外开

放的资本、技术积累与外汇的储备，更是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现实基础。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循环（内需）和外循环（出口）是息息相关、共生共存的统一经济体。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循环，就没有今天中国社会如此大规模与如此大成就的内循环（消费能力与水平的普遍大幅度提升）。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不是对国际循环的否定，更不是对外向型经济的否定，而是经济结构优化、现代工业体系营建以及更高水平开放格局构建的整体战略布局，它是 40 多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也是这一政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更深刻且具有挑战性的拓展与深化。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并更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形成具有制度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潜能的经济结构及健康循环经济体的重要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的优化及健康循环经济体的形成,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及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特征的健康循环经济体的构建、形成及富有绩效地运行。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深圳经济特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过程中的使命是什么?笔者认为深圳应该继续发挥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积累及经济结构优势,在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路径探索与制度创新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面,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创造、提供更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障“双循环”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高水平开放渠道、高附加值出口商品结构、高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

一

外向型经济及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既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所积累的物质财富与制度性资本,又是深圳在中国整体经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功能。深圳作为高结构外向型经济的城市,在实现“双循环”格局中具有源于自身发展积累的独特功能;作为率先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实现“双循环”格局中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深圳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列,继续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拓展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渠道与实践路径,这既是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又是有效实现“双循环”的大前提。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同一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改革的决策,就不可能有开放的实践。而以开放促改革,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与路径,也是今天更高水平开放制度创新逻辑路线与选择。开放既是改革的需要,更是今天推动改革向纵深迈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深圳是一个典型并成功的外向型经济的城市。2019年全市进出口总额29773.86亿元,约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其中,出口总额16708.95亿元,连续2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①深圳进出口总额不仅是拉动深圳经济的现实力量,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历史上看,2016-2019年,深圳外贸占GDP比重分别为131%、124.8%、123.7%和110.6%,^②尽管在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整体背景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依然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从对外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2009年至2018年,十年来深圳地区的进出口差额(净出口)逐年稳步上升,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十分显著。由2000年的537亿美元逐年增至2017年的745亿美元;2018年受国际经济环境(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进出口差额(净出口)下降了48.03%,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也由2009年的41.2%以每年10%左右的降幅至2017年的21.6%;2018年深圳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以51.7%的降幅降至10.4%。但是,从进出口总额中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市进出口总额比例呈逐年稳步上升,由2009年的23.6%以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增至2018年的53.8%。^③民营企业既是深圳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又是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坚实基础,尤其占深圳高新技术产业95%以上的充满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更是一种源于社会发展特质与积淀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在疫情的大背景下,2020年1-3月,深圳累计进出口5747.8亿元,同期下降11.7%;1-6月,累计进出口13356.7亿元,同期下降0.5%;但1-9月,进出口21803.3亿元,整体增长2.7%,依然呈现出高度外向型经济的特质。^④

无论数据如何变化波动,深圳在中国整体经济布局中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城市。这是深圳的优势,是深圳得以继续保持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来自40多年改革开

①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官网,《深圳市2019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9》。

③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9》。

④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月报》2020年9月。

放的深厚积淀，更是其经济具有无限发展潜质的力量源泉。深圳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独特禀赋，并且在创新中将其拓展、提升。

由于外向型经济对国际市场具有高度依赖性，国际市场乃至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外向型经济的兴衰。所以，深受世界经济环境优劣的制约，是外向型经济的自身弱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要提出以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从而改变单一生产外向型经济，旨在使整个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使包括人才在内的资金、商品、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本国货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世界性货币的经济外向型经济过渡与迈进的战略部署。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在开放，中国就在开放，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深圳保持高结构外向型，中国就会加快高水平开放型，深圳是保障“双循环”格局的强而有力的国际大循环的“出海口”与“风向标”。所以，深圳应该以其先行示范的行动，为进一步开放的中国探索、拓展更高水平开放的渠道、路径与模式。

二

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是“双循环”的基础，也是更高水平开放的内在基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将我国市场规模和生产体系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的制度优势，从而形成由制度性资本所构成的国际竞争力。深圳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质与充满可持续竞争力的优良的产业结构，这是深圳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从而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不断融入世界市场，赚取了不少的外汇收入，但是相对而言内需的发展有待提高（受制于区域与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普遍提高）。目前我国不仅是“全球工厂”，也正在发展成为最大的“全球市场”。2019 年德国的外贸总额占其 GDP 的比例已经上升至 70.8%，但是，德国的消费品市场只是略微超过

1 万亿美元（与人口因素有关），远低于中国和美国（2019 年美国继续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超过 6 万亿美元）。^①但机构学者预测，按照当前的增长趋势，2021 年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品市场。这同时也说明了与德国相比，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国内市场。这也是 2019 年全年在全球经济普遍下滑，国际贸易全面疲软的情况下，德国经济增速下滑速度比中国与美国更严重的原因所在。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2019 年发布的调研报告认为，到 2035 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欧盟之和，成为超 10 万亿美元的全球顶级消费市场。如果预测成真，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会更加稳定，抵御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将会增强，更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高质量，并将成为国际企业最重视的市场，从而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与这一结构调整相伴的内需与外需产品结构，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变与质的提升。当然，缩小区域及城乡差距，提高可支配收入水平也是根本的原因。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的原因（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尤其技术的约束，以出口替代为战略选择的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出口替代也是 20 世纪 60 年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一种对外经济战略。出口替代旨在通过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与出口，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带动国内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基本沿着出口替代的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方向前行的。当然，出口替代战略的成败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国际市场容量处于扩大势态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依靠本国在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凭借这一战略获得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然而，在世界经济增长减慢，尤其是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

^①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

下,不仅出口替代的困难会导致交易成本大幅增加,并且很有可能面临陷入债务危机的危险。

与出口替代战略相对应的是进口替代。所谓进口替代,就是以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取代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以进口替代实现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进口偏向型增长”。但是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长期把资源用于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最终将会减少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资源投入,从社会总需求均衡的角度来看,进口的减少通常会在长期中导致出口相应减少。因此,进口替代的经济增长,将降低对外贸易占一国GDP的比例,从而形成一种偏于内向型的发展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不仅使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至21世纪初期)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以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发展也成为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当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出口导向战略对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能带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尤其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多元的转型大国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是永远优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这也并不绝对意味着伴随着出口替代,以及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提高的进程,出口替代必然或必须被替代。

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必须从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入手,没有健康、合理、可持续性并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的支撑,就无法改变一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从而提高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

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是由一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当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是廉价劳动力时,在国际分工链条中就只能处于末端的位置;而当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是技术与资本时,尤其是核心技术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位置。所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提出的“十四五”规划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创新型

国家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是统筹一体的。创新将助力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同时创新的经济绩效与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又将会以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改变的方式,改变着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从而带来由过度“出口替代”向遵循市场规律的有序并富有战略定位的“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结构转变,这一战略转型还意味着一个健康循环的国内外双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从单纯外向型经济走向国内国外双市场、双循环的有机互补型经济结构。

40多年来,深圳出口结构已战略性地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机电、高新技术产品装备等转变。目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已降至14.8%,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则分别提升至75.5%和48.7%。深圳的产业结构凸显“三个为主”的特质: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40.9%;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0%;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占GDP比重60.5%,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提高至70%以上。^①同时,深圳牢牢拥有文化创意、高新技术、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四大支柱产业;稳稳推进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现代企业体系营建方面无疑走在全国前面,并以其创新的辐射力为全国提供产业结构优化和现代企业体系营建的新动能。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深圳应该继续发挥其自身经济结构优势,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以具有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以高资本、高技术附加值的出口产品,以先进制造业所带来的更高水平开放,保障、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稳步有效的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机促进,高水平实现。

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体,也可以同时是一个拥有强大制造业的经济体。如德国,2019年德国的进出口商品总额约为24317亿欧元,贸易顺差为2236亿欧元。24317亿欧元的外贸总

①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2023年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

额,按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高达2.722万亿美元,与德国的GDP十分接近(德国2019年实现的名义GDP为34359.90亿欧元,按平均汇率折算是3.8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2019年德国的外贸总额占其GDP的比例高达70.8%,但德国依然是欧洲制造业实力最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①从经济结构来看,深圳具有高品质外向型经济与高端制造业同时并存的双优势。

三

完成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制度转型,是真正实现“双循环”的制度保障,也是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保障。而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的过程,就是有利于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的营建过程。今天的深圳既拥有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物质财富积累和制度性资本积累,又拥有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中央授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应该充分利用自身包括区位优势在内的独特要素禀赋与业已优化的产业业态的竞争力,对标国际先进城市,在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制度保障的制度创新领域,创造出富有制度绩效的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做法。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责任与使命,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新时代的功能。

第一,深圳应该学习、借鉴全球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培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方面打造“中国样板”。

自2008年科尔尼第一期《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旧金山、新加坡等城市稳居世界最佳营商环境城市第一梯队,这些城市备受全球最优秀企业和人才的青睐,拥有商业活力、创新潜力、居民幸福感和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综合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和个人实现成功发展。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的分析和排名中,中国的总体排名比上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位。这也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香港在190个

经济体中位列全球最便利营商地的第三位,排名较之上年上升了一位。在2020全球营商环境榜单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近十个国家被列为改善最为显著的经济体,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实施改革措施,全球范围内所记录的五分之一的改革事项与措施均来自于这些国家。^②这再次证明,变革与创新永远是实现改革目标的制度通道,提高社会制度绩效的改革,是获得发展的根本动力。

12月21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2020年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报告显示,深圳营商环境位居榜首,第二、第三、第四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③

营商环境其根本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通常人们会遵循“制度——行为——绩效”的路径来评价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制度环境通过作用于要素配置效率,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同时反应区域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全球营商环境第一梯队国家的成功实践显示,对人才的吸引力是营商环境优势与竞争力的重要展现。人才是第一位的生产要素。甚至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步伐的快慢,主要不是取决于该社会有多少人才,而是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能留住人才,并使人才这一稀缺要素能真正人尽其才。人才最需要的不仅仅是优惠政策,更需要施展抱负的产业和企业平台。但是,人尽其才的关键不仅仅是区域产业及其业态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凝固力,还有制度环境通过给予人自由选择权利和尊严感得以保障、实现的各项制度安排,使人的经济价值获得提升可能性。人才是高品质的生产要素,人才的价值实现在于自由流动。能保证要素无制度障碍流动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才的社会。一个人才辈出的社会,是昌明且奔向繁荣的社会;一个尊重人才的社会,是文明且道德的社会;一个能留下人才的社会,是温暖而又拥有美好未来的社会。如果说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那么

①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https://www.destatis.de>。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19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③ 数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2020年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人才友好型社会则是留住人才并使其为城市创造辉煌的制度——文化环境乃至土壤。所以，探索超大型开放城市国际化人才引进的制度通道，既是深圳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深圳先行示范的使命。

第二，深圳应该真正用好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担负起为香港与祖国大陆共同繁荣进一步消除制度文化障碍，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提供平等机会。用好香港因素，让分享发展与共同繁荣成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共同收获，这是历史赋予深圳的国家责任。

深港两地总计面积仅有 3000 多平方公里，但二者 GDP 之和达到 4.08 万亿元，相当于上海的 1.48 倍，是珠江口周边与杭州湾周边的总量之和，而珠江口周边地区 GDP 合计，相当于杭州湾沿岸的 1.51 倍。香港和深圳的人均 GDP 分别为 29 万元和 16.74 万元，明显高于上海，深港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高品质引擎作用的卫星城市，并共同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裙带增长极。

加拿大菲沙研究院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度 2020 年度报告》显示，香港以 8.94 的评级高于新加坡，连续 24 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自报告发表以来，香港一直名列全球第一）。^①菲沙发言人认为，自由市场原则一直是特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考虑以及香港经济的基石。香港有优质的司法制度、廉洁的社会风气、透明度高的政府、高效的监管制度，以及高度开放的环球商贸环境，加之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简单低税制、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高效的政府为香港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并镶嵌在社会机体内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从而使其能够保障企业蓬勃发展，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向上。

香港与深圳共同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增长极，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引擎。香港无论对深圳还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都是独特的资源，用好香港因素，深圳肩负国家责任。发挥好香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对接好香港业已形成并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科研平台和高等院校的研究能力与资源，在深港两地深入合作中，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营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汇集更有效的资源，寻找可借鉴的经验，从而实现深港两地乃至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共同发展，分享繁荣与富裕，是新时代赋予深圳的新的历史使命。

第三，深圳应该继续发挥好自身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甚至跨国际区域的创新引领优势，为区域协同创新及创新型国家建设探索实践路径与制度供给；充分利用好业已形成的，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的数字经济业态，在以数字经济为主要动力完成现代工业体系营建的同时，为数据要素市场的营建及体系化、规范化运行提出深圳经验与方案；在以规则衔接为切入点增进服务贸易的同时，向国际惯例接轨，使深圳成为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更高水平的制度——规则窗口。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位列世界科技集群第二位，排名位于日本东京——横滨之后。^②2020 年深圳双创综合指数依旧蝉联全国首位，是最注重创新创业环境综合提升的城市，不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而且还通过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从而降低创新创业的交易成本；深圳是双创资源开放配置力度最大的城市，不仅出台了极具吸引力的引才政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仅次于上海（20.59%），与北京（16.97%）持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而仅 2019 年深圳市科学技术支出就达到 548.4 亿元，占 GDP 的 2% 左右，也是全国大中城市最高的，科学技术支出重点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创新，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深圳是双创价值与社会成本平衡最佳城市，表现为更有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明专利、更低能源消耗。同时，促进“双创”可持续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高达 34.28%，成为中国大中城市中唯一一座占比超过 30% 的城市。2019 年，深圳市专利授权量 1666000 件，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 6.73%，在国

① 数据来源：加拿大菲沙研究院，《世界经济自由度 2020 年度报告》。

②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内创新活动高度活跃的城市中超越北京(132000)成为首位,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以61.69件/万人的水平超过北京(60.36件/万人)位居全国之首。深圳“双创”的优势展现的是城市创新的活跃度与潜质,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与价值导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增长极,已具备并成为区域创新的核心引擎,在构建“强强联合”的核心创新圈层的区域创新机制进程中,以集聚效应到扩散效应的释放,引领区域的创新走向与高度,为区域协同创新及创新型国家建设探索实践路径,创造制度供给。

数字经济不仅业已成为深圳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深圳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内生因素。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在疫情影响下逆势增长,实现增加值403.54亿元,同比增长4.9%,这充分展现出数字经济业态价值创造形式的独立性和自身参与社会经济运行与价值创造的张力。^①面对发展前景无限广阔的数字经济,如何建立数字经济的有效支撑体系,完善信息安全及市场化使用的软件系统;如何逐步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硬约束,尤其是“缺芯少魂”的致命尴尬;如何扩大重大平台载体,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和集聚效应;如何由主要依赖腾讯、中兴、华为三巨头(软件收入占全市比重达65.4%)的局面,逐渐走向龙头带动下的业态集群的形成,这既是深圳面临的制度约束亦是制度创新的领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更高水平开放的先行城市,深圳在体现外向型经济结构高下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方面具有雄厚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927.09亿元,比上年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6406.06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60.9%。在现代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2101.47亿元,增长12.0%。2018年深圳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708.4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3%。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圳服

务出口规模不断扩大。^②深圳市2019年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工作会议公开数据表示,2018年,深圳共承接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累计执行金额为10.25亿美元,占全市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的20.94%。在新旧动能转换以及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深圳服务贸易的增长将通过规则衔接的方式,成为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更高水平的制度一规则窗口。

另外,数字经济乃至数字技术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就是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大部分是本地化、不可贸易的,但是数字技术则会改变这种情况。可以说,不断成长壮大的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强劲支撑下服务贸易的迅速增长、拓展,不仅共同构成了深圳经济发展的崭新动能,更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更高水平开放的经济释能。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发展策略的调整,同时更是国际战略路径的调整与再思考。要想长期维护一个世界中崛起的中国,首先要有一个中国中的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国需要在国际上为接受一个世界中的中国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同时在国内为接受一个中国中的世界找到最高限度的共识,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先行示范的深圳,则肩负着这一制度探索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罗培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方法·规则·案例[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9.
- [2] 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专家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研究报告(2020)[R].2020.

作者:陶一桃,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熊哲文

^①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2020年一季度深圳经济运行情况》。

^②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